
近 10 年来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

宋 力 曾祥健

60 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也由此开端。由于卢沟桥事变在抗日战争史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近 10 年来,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

一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及背景

卢沟桥事变缘何而起?它的发生是否偶然?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日本一些学者,特别是部分前侵华军人的著作多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说事件之火“是在从没有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地点燃的”^①,“完全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②其主要论据可以概括为“重点对苏论”、“无计划论”、“非阴谋论”。“重点对苏论”即认为日本特别是日本陆军当时主要是以苏联为假想敌,正致力于“加强对苏战略”而“无暇他顾”;“无计划论”即认为日本在用兵上“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准备”;所谓“非阴谋论”,就是认为卢沟桥事变与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柳条湖事件那种有预谋的情况不同,它不是日本策

①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 卷第 1 分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 页。

② 服部卓四郎:《东亚战争全史》(一),商务印书馆 1984 年译版,第 13 页。

划的阴谋,而是偶发性事件。

针对日本一些学者的‘偶发论’观点,中国学者引据大量史实进行驳斥,指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不仅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的,而且这种预谋性有其深刻的根源。^①理由是:1.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奉行军阀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日本有些学者与中国学者达成了共识,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上,“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究其原因,与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对外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他们大肆扩军备战,以对外侵略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正是这种“最高目标”的特殊要求。2. “大陆政策”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阀主义道路,精心炮制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部;第五步征服全世界。1927年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奉折》中公然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方针,主张对中国的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即武力征服的手段。根据这个侵略计划,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最后又很快挑起卢沟桥事变。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提出、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即是不断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扩张、战争升级的过程,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大陆政策”,才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3.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企图摆脱经济、政治危机和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的需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继续采取扩军备战政策,片面发展军需工业,致使日本民用工业生产大大减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解决庞大的军事预算、筹措扩大军事工业的

^① 庄明坤等:《“卢沟桥事变”起因浅析》,《江海学刊》1987年第5期。

足够资金,发行公债指数不断增加,致使日本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国内阶级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和激化。为摆脱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日本迫切需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和斗争目标。由以上可见,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策划的。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背景问题,史学界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分别作了探讨。在经济背景方面,有学者深入研究了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以及经济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不仅有掠夺资源、扩充军备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动机,而且包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略上的考虑。”^①理由是:1. 从日本在华北的投资看。1931年以前,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投资重点转向华北。到1936年底,日本在华北投资已占对华投资总额的43.5%。由于投资激增,华北逐渐成为日本所谓的“特殊利益地区”;其战略地位明显增强。2. 从日本侵华的意图看。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华北成为它的主要侵略目标。为使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策动汉奸推行了“华北自治运动”,于是打出了“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旗号。

在政治背景方面,有学者指出:“蒋介石政府顽固执行‘攘外安内’政策,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造成中国抗日力量内耗、国防空虚,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可乘之机。”^②理由是:1. ‘安内攘外’造成东北沦陷、华北兵力空虚,使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2. ‘安内攘外’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扩军备战时间,做好了侵华战争的准备;3. ‘安内攘外’使日本得以掠夺东北及华北,弥补了国内资源缺乏的弱点,加速了经济军事实力增长;4. ‘安内攘外’使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内耗,扩

① 王同起:《‘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3期。

② 赵三军等:《安内攘外与‘七·七事变’》,《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1期。

大了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差距。

二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关节点”

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关节点”，即卢沟桥事变是否为中国抗战的起点以及中国时局的转折点两个问题，引起人们的争论。

在起点问题上，史学界经过长期争论，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①其理由是：1.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的侵华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并未拟定出具体的、完整的、全面的侵华计划，日本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及是否扩大侵华仍存有严重分歧。而卢沟桥事变前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事变前，从日本驻屯军兵力扩充及演习情况、日本的“国策原则”以及“1937年度的用兵纲要”上看，都出现了全面侵华的倾向；事变后，日本中央统帅部立即作出向中国大量增兵的计划，并全面调整日军战争序列，进行作战部署。由此表明，日本全面侵华已经开始。2.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发生事实上的本质改变。事变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是几方面的交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阶级对立而未真正实现。卢沟桥事变则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和中国人民的抵抗，已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内容。3. 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率先通电全国，号召人民、政府与军队紧密团结，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蒋介石也于17日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抗日。这标志中国人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不是卢沟桥事变，而是九一八事变。^②这是近年来出现的并已为较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其

① 董会仪：《卢沟桥抗战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开端》，《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4期。

② 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

理由是：1. 从日本方面看，早在 1927 年‘田中奏折’中就表明了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日本用武力霸占中国东北以及后来相继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等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升级，而不是开始。2. 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看，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国民党政府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但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却自发地开展起来，并从未停止。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意愿、态度、政策如何，中国人民已掀起了全面抗战。3. 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看，九一八事变‘使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独吞中国的阴谋付诸行动，改变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均衡，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大变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可以是卢沟桥事变，也可以是九一八事变，即前两种观点可以并存。^①理由是：1. 作为专史，从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着眼，抗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便一直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延续的时间是 14 年。2. 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特定时期的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的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则应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共 8 年，俗称‘八年抗日战争’。

在转折点这个问题上，史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卢沟桥事变第一次实现了我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局部抵抗到全面抗战的重大历史转折，因而成为‘时局的转折点’。^②理由是：1. 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帝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不准人民‘妄言抗日’；共产党虽然坚决主张抗日，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没有能够团结各方面的抗日

① 王桧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史学史研究》1991 年 2 期。

② 刘道华：《‘七·七’抗战的历史意义》，《天津师大学报》1987 年 3 期。

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2.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和平谈判,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从自发和局部的抵抗转向全面抗战的可能,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则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3.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大力声援、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卢沟桥和平津,奋勇抗战。随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从而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使中国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另一种意见,卢沟桥事变不是“时局转折点”。他们提出“日本对华北的进攻并没有打痛和逼急以江浙一带作为统治中心的国民党当局,国民党仍不肯放弃反共国策,仍指望日本不扩大战争,对苟且偏安仍抱有幻想。直到日军悍然把战火烧到上海,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时,蒋介石集团才抛弃幻想,决心同中共合作,一致对外”。因而主张时局转折点应为八一三事变。^①理由是:1. 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虽然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但直到八一三事变前,双方终未达成协议。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看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无法避免,动员包括红军在内的全国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已刻不容缓,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改变。正是在八一三变动的促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2. 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开始一致对外,抗日救亡浪潮席卷全国,这种团结御侮的局面使原先严重阻碍中共及其军队发展的主要障碍消失了,这为敌后抗日战场的开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基本条件。

除上述两个“关节点”问题外,还有学者提出卢沟桥事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②其理由是:1.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征服中国、占领东亚、争霸世界战略行动的第一步,它的爆发完全改变

① 白杰:《论“八·一三”事变是时局转折点》,《争鸣》1993年4期。

② 石林:《“七·七”抗战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史学月刊》1992年5期。

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使法西斯侵略战争揭幕。因此,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战争绝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世界总格局的重大事变。一方面,日、德、意轴心国紧急地结成了法西斯同盟,使三个战争策源地联成一个整体,发动了世界性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使东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与西方反抗德、意法西斯的战场形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统一体,有机地组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则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卢沟桥事变理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三 关于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外关系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10年来学术界论述颇丰,中德、中美、中苏、中英、中意等关系均有论及。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事变前后中国与德、美、苏三国关系为例,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事变前后的中德关系。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德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友好”到破裂的过程。曾巍等人指出事变前特别是30年代中德间建立了其他列强不可比拟的外交关系,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并于1936年达到一个高潮,尽管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利益需要的“友好”关系在上升时期就因为“陈济棠问题”、“伪满洲国问题”,尤其是“德日结盟问题”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并没有使双方合作关系受到太大的影响,两国仍保持密切的往来。直到中德关系发展中介入了新的因素即日本全面侵华方针已定,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德国的对华政策才逐渐发生转变。^①

关于转变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德国是一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曾巍也认为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希特勒就开始酝酿改变对华政策,特别是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更坚

^① 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2年4期。

定了其对华政策的转变。从此中德关系一步步倒退。^①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王建朗指出,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为维护中德关系的继续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日中间保持了一种“中立”的态度。^②在中日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德国还一直希望中日能谈判解决争端,为此策划陶斯曼调停。梁星亮等人则指出,抗战初期,德国不仅没支持日本侵华,相反采取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政策。事变发生后,德在“震惊之余”,先是附和英、美等国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继而以日本违反《反共产国际协定》为由,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因此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同时在行动上继续向中国输出大量军火和顾问人员,支持中国抗战。^③

一些研究者还对中德关系发展由“友好”到破裂这一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方世敏提出了转变的两点理由:一是国民政府对纳粹德国本质认识和政策估计出现严重偏差。国民政府单纯地认为中、德同受帝国主义的束缚,是“患难伙伴”,忽视了中、德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基础,因而对德抱有幻想,企图与德结盟,以致在中、德关系处理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二是纳粹德国在全球战略中的远东政策,决定它在中、日间作出抉择时必然抛弃中国。德国法西斯本性决定了它在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中特别需要日本这个对一战后世界格局不满的强国的支持。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虽对德国扩军备战有一定经济意义,但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德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是无法同日本相比拟的。^④曾巍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德关系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德国实行的是无长远目标的实利主义投机性外交政策,因而对华政策不稳定且无信用,再加上蒋介石国民政府推行亲英、美的外交政策,

① 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2年4期。

② 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4期。

③ 梁星亮:《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2期。

④ 方世敏:《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走向述评》,《湘潭大学学报》1993年3期。

忽视与德国关系的发展^①，这些都是决定德国在中、日间取舍的因素。

(二) 事变前后的中美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在事变前后没有质的飞跃，变化不大。事变发生前，尽管南京政府形成并确立了以英美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对华侵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奉行所谓的“独立国际主义”和非军事干涉政策，对蒋政府反应冷淡，中美关系处于低潮。^②事变发生后，美国不仅仍执行“不干涉政策”，而且依据所谓“中立”法案，向日本大量销售战略物资，实际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③

研究者还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侧重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调整，即以对美国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并于1938年逐步完成了这一转变。^④但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发生改变，目前史学界有一定分歧。张圻福指出，事变爆发后，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引起了美国朝野重视，但丝毫没有改变华盛顿当局的远东政策，美政府继续执行所谓“不卷入战争，又使战争不致扩大和延长”的理想主义外交路线。罗斯福甚至为避免与日本发生摩擦，发表了“9.14声明”，助长了日军的对华侵略。^⑤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卢沟桥事变后，美对华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对事变的最初反应是宣布对中国不援引中立法，暗示中国政府可以从美国购买运进战争物资；他还预见到了美、日难免一战，因此美国务卿史汀生等人主张对日实行禁运；罗斯福甚至构想中国成为美地面部队的作战基地，进而使中国能打败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取代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的盟友；此后罗斯福发表了“防疫演说”，暗示美国将采取

① 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2年4期。

② 张圻福：《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安徽史学》1995年2期。

③ 胡大泽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看它在抗战前后的对华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5期。

④ 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4期。

⑤ 朱坤泉：《论抗战之初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2期。

行动;接着罗斯福还试图敦促国联通过谴责日本侵华公报。^① 尽管这些举措因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未实施,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对华政策已有所松动,从而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华政策全面调整打下了基础。

(三)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在大的方向上史学界已取得一致,都认为事变前后,苏联均实行了援华政策,国民政府也在事变发生后实现了由“防苏”向“联苏”外交方针的调整。^② 但在中苏关系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史学界出现了如下争议: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的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是条约的受惠国,条约对苏联却没有意义或意义很少。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指出,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首先是苏联主动提出要在中、苏间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在事变爆发前二年中苏间就开始了有关谈判,之所以未能形成共同意见,是因为国民政府对苏动机还持有疑虑;其次,中苏签约有附加条件,中国必须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样也就最终打破了日本联华制苏的幻想^③;此外,中苏签订的是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互助条约,这样就使苏联避免了直接卷入战争的危险,又可以援助中国抗战,由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④

关于苏联援华的性质。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认为苏联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一种是全盘肯定,认为苏联完全实行国际主义,是无私的。近10年来研究成果已逐渐发生变化。王真指出,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应将初期和后期加以区别,他认为,在抗战初期苏联援华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

① 胡大泽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看它在抗战前后的对华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5期。

② 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历史档案》1991年1期。

③ 王建朗:《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4期。

④ 李鸿文:《卢沟桥事变、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2期。

其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的,是国际主义。^①但有的学者也指出尽管抗战初期苏联政府全力支持中国抗战,并及时提供大量援助,但对华政策中的利己主义倾向也有所表现,例如苏联支持中国抗战是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基本出发点的。^②还有些研究者认为,苏联在推行援华政策时,出于其远东战略的考虑,并未尽其所能,全力援华,而是有限度的,有利己主义的一面,其表现是:1. 既有效支持中国抗战,又不导致苏联单独卷入战争;2. 援华不能影响苏联军备建设;3. 援华不能导致日本过分紧张。刘志青认为,苏对中国的援助是有偿的,一方面贷款有利息,另一方面,偿还贷款的物资大都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品,这对中国是有害的。^③

李鸿文对苏联援华政策性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认为苏联在对待中国关内和东北抗战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苏联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抗战,并积极援华,这与其在‘九一八’后对日本侵略东北所持的“中立主义”或“不干涉主义”态度相比,有一个重大改变,这也正是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苏联对东北地区抗战态度却存在二重性,有支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继续保持所谓的“中立主义”立场,甚至公然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以适应日本的侵略要求,充分表现了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④

四 关于卢沟桥事变中有关人物的研究

(一) 蒋介石与卢沟桥事变。过去有人认为,蒋介石对事变采取

①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5月版。

② 朱敏彦:《试评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民国档案》1990年4期。

③ 刘志青:《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2期。

④ 李鸿文:《卢沟桥事变、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东师大学学报》1994年2期。

了低调处理的态度,事变后继续坚持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投降方针,结果导致了日本侵略的进一步加深。近10年来,不少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蒋在事变中的表现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即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御侮抗日”。但在转变的具体程度上,目前史学界有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了“谈判”与“备战”并重的双重方针。^①持此观点者认为,一方面蒋介石对事变的解决,仍抱有很大的“和平愿望”,以“不求战”、“不挑战”来保留对日谈判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与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时不同,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提出了“应战”和“必抗战”的口号,这还是第一次,说明了他此时已有抗日的打算。此外,他在实际行动中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抗战的积极准备,例如他一面督促宋哲元等“固守勿退”,另一方面又调兵北上支援二十九军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下了抗日决心并具体组织领导抗战,没有经历一个在“谈判”与“备战”间游移不定的过程。曾景忠指出不主动求战,但决心应战,是蒋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7月8日蒋给宋电报及其后致第二十九军的数封电报,都表明了蒋抗日的决心。蒋还在派兵援宋的同时,“对全国抗战及时作出了各种安排”。^②此外在政治宣传、外交方面,蒋对日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③这都表明蒋已开始组织领导抗战。

以往研究者多从客观上考察促成蒋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曹德贵则从主观因素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蒋所具有的民族意识是他转变政策的主观因素,“蒋尚有民族情绪,蒋能抗战”。蒋多次提到的“最后关头”便是其政策转变的临界点。“和平未到完全

① 吕梁、王树荫:《抗战史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概述》,《教学与研究》1990年1期。

② 曾景忠:《关于抗战的起点问题》,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③ 肖霖:《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及对策》,引书同上,第211、215页。

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冲破了最后关头的界限,蒋不甘心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自己作日本的傀儡,再加上他内心深处以中华民族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使他无法接受臣服“倭寇小邦”的事实。这种民族意识的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其对日政策由妥协转向对抗。^①

(二)宋哲元与卢沟桥事变。目前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宋在事变中的所作所为都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热衷“和平谈判”而疏于军事准备,幻想以局部妥协谋求苟安,一再错过有利战机,最终造成了平津失陷的失败结局。研究者对宋哲元对日妥协的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荣维木认为:首先,宋对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目的认识不足。宋自主政华北以来,对日军进攻并非全无防范,但是对于卢沟桥事变乃是日本大举进攻华北和中国开端的严重性,宋却丝毫没有认识到,仍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宋对蒋心有疑惑。宋不仅不信蒋能真下抗日决心,还十分惧怕蒋以抗日名义剪除异己。宋曾说过:“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另外,宋哲元确曾受到第二十九军内部主和派的影响,幻想保存地位和势力。^②研究者还指出,在另一方面,由于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与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爱国热情的推动,宋哲元在对日妥协中不敢走得太远,完全投向日本的怀抱。^③

还有学者认为,宋哲元“以守为守”的消极抗日方针不仅未能守住平津,而且加速了平津的失陷进程,但是将过错完全归罪于宋哲元,则是违背历史实际的。郑志廷指出,蒋介石也应负一定责任^④,理由是:1. 宋哲元一度对日妥协,固然有幻想保存实力与地盘的原因,但蒋介石摇摆不定的态度也对其产生了影响。王树芹也

① 曹德贵:《蒋介石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2期。

② 荣维木:《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放弃“以攻为守”的原因》,《历史教学》1993年2期。

③ 徐山平等:《“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前的宋哲元》,《中州学刊》1990年5期。

④ 郑志廷:《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河北学刊》1990年5期

赞成这种认识,他甚至还指出,宋是根据蒋的“意旨”与日谈判以求妥协的。^①2. 从蒋给宋的命令看,言下之意都是“只应战,不求战”。这与宋“只许抵抗,不准出击”的方针可以说是同出一辙,可见宋是遵守了蒋的命令。另外,蒋当时虽然明令孙连仲等调兵北援,但并未进行周密的部署。因此郑志廷指出,蒋、宋二人在平津抗战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完全正确、一个完全错误。就其二人所采取的方针来看并无原则性差别;在平津失陷责任问题上,宋的确有过,但蒋亦难辞其咎。至于说宋未执行蒋命令而致使平津迅速沦陷,更是无稽之谈。

(三) 张自忠与卢沟桥事变。对于张自忠在事变中的表现,目前史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1. 张自忠是否力主议和。多数研究者将张自忠看成是主和派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早在事变前,张就与日本打得火热,在几桩事件处理上明显地对日妥协;事变发生后,张更坚决反对主动向日军出击,力主言“和”,并且他还亲自出马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约活动,“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固地盘”。^②为取信日本,他甚至还要求宋哲元取消既定的作战计划。研究者还对张自忠甘愿充当主和派代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1)日本人愿意接受他,张一向对日较“温和”;(2)张拥兵自重,自信能力挽危局;(3)宋哲元倚重张自忠;(4)张为日本和平烟雾所迷惑,认为卢沟桥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张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主和派的代表人物。^③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张自忠在很大程度上是奉命行事,却又代人受过,有口难辩”;张自忠与日和谈签约完全是听命宋哲元而做的违心事,他在内心里是不主张议和的。^④

① 王树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述评》,《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

② 荣维木:《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放弃“以攻为守”的原因》,《历史教学》1993年2期。

③ 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史学月刊》1990年6期。

④ 沈继英等著:《卢沟桥事变前后》,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2. 张自忠留守北平真相。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史学界也有两种相左的观点,一说为临危受命,代人受过;一说为“逼宫”夺权,附敌为奸。前者认为,张留守北平是临危受命,顾全大局,体现了一个军人服从命令和自我牺牲的精神。^①理由是:首先,张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将领,他的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第二,宋能出任第二十九军军长,主要得力于张的拥戴,且二人关系融洽,张绝不可能反宋;第三,宋离平赴保是蒋的主张,也正是宋为保存实力而作出的选择,与张无关;第四,在平津局势不可逆转情况下,“逼宫”留平必将遭人唾弃,张不可能干此蠢事;第五,张留平期间并无丧权辱国的表现。研究者还从宋哲元的角度指出其令张留平的真实目的:其一,以张为缓冲,借以分解平津失守的责任,实则宋“舍卒保帅”,张代宋受过^②;其二,留张与日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

“逼宫”说者针锋相对,认为张以危局胁迫宋哲元离平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张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尽管后来宋多次公开表示张确系奉其命令而留守北平,但研究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宋故作姿态,笼络人心的一种策略。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到底该由谁承担平津失守的责任问题,但宋个性倔犟,重名节,这决定了他是怎么样也不敢说出他离开北平之前,张自忠曾逼他交权下野这段令他难堪的耻事。此外张自忠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逼宫”之举有悔悟之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事情的真相。^③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七队)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林治波:《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的真相》,《史学月刊》1992年5期。

② 吕伟俊主编:《宋哲元》,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③ 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史学月刊》1990年6期。